

研究論文

國家與客家：新加坡與南洋客屬總會為例

莊仁傑*

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

本文將以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為例子，從南洋客屬總會過去所出版的五本會刊，東南亞華人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如何影響東南亞客家認同；同時客家認同的變化過程，又如何反映了當時正在進行的國家塑造過程與國家社會工程。此外，本文也引用王賡武的東南亞華人多元認同理論來檢視東南亞客家認同，並藉此討論此理論如何運用於東南亞客家認同的研究。

關鍵字：南洋客屬總會、新加坡、客家認同、東南亞、會刊

* 莊仁傑，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研究員，通訊地址：29, JALAN LADING 10, TAMAN PUTERI WANGSA, 81800 ULU TIRAM, JOHOR, MALAYSIA.，電話：(60) 1126780173，電子信箱：henry72783@hotmail.com

Research Article

Nation and Hakka: The case study of Singapore and the Nanyang Khek Community Guild

Henry Chong Ren Jie*

Research Fellow,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Abstract

In the article, five anniversary souvenir magazines of the the Nanyang Khek Community Guild, Singapore, will be analyzed, in order to discuss how nati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have been affecting and changing the Hakka identity of Southeast Asian Hakkas between 1939 and 2009. The process also reflects how the creation of new nation affects the Hakka identity of Southeast Asian Hakka. Moreover, Wang Gungwu's study of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is applied in the article, and discuss how to apply it on the study of identities of Southeast Asian Hakkas.

Keywords: the Nanyang Khek Community Guild, Singapore, Hakka Identity, Southeast Asia, journals

* HENRY CHONG REN JIE , Research Fellow,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Address : 29, JALAN LADING 10, TAMAN PUTERI WANGSA, 81800 ULU TIRAM, JOHOR, MALAYSIA. Tel: (60) 1126780173, E-mail: henry72783@hotmail.com

一、前言

認同意識一向是族群研究中的熱門議題之一。台灣客家認同在台灣客家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例如陳麗華（2015）的《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討論了六堆客家人在近三百年裡，在清政府、日本政府和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當地的客家認同如何建構、形成與維護。林正慧（2015）則把範圍擴大至整個台灣，討論台灣客家的形成過程之餘，也討論了台灣客家的認同意識（認同意識是族群塑造的重要因素）。

東南亞的客家認同是個較少研究者碰觸的議題。由於東南亞地形破碎，以及東南亞客家人受到東南亞華人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的影響，再加上東南亞各地客家的發展都有些許不同，因此難以一言以蔽之。例如東馬和西馬雖然都是馬來西亞，但是因為兩地的客家社群在地理和歷史上有所差異，因此無法一概而論。因此大部分的研究都以東南亞某個地方的客家人為研究對象，以案例的方式來討論東南亞的客家社群。例如黃賢強（2007，2008）所編的《新加坡客家》、《新加坡客家文化與社群》等書，就以新加坡客家作為研究對象。此外，賴郁如（2018）探討新加坡早期的客家認同，指出十九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初這段期間的新加坡客家人，除了以方言群認同和地緣認同來維繫客家認同之外，客家認同之中也可細分出『集團認同』這一層次。

如此情況下，少數幾篇研究東南亞客家認同的文章大多是以某群體作為個案研究，例如以某地的客家族群或者留學生團體等作為研究對象。張翰璧與張維安（2005）以台灣的國立中央大學的馬來西亞僑生作為研究對象，結合馬來西亞的考察資料，指出馬來西亞的客家認同在公私場合都不明顯。蕭新煌和林開忠(Hsiao

and Lim 2007)的〈The Formation and Limita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則是少數幾篇以全體新馬客家人作為個案，從歷史、社會和經濟角度來討論客家認同問題。此文主要從十九世紀新馬地區的客家會館的成立來進行討論，並指出了馬來西亞成立後，因為華人認同和國家政策等外部因素等關係，限制了客家認同。特別是在1970年代馬來西亞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後，導致客家認同被淡化了。

此外，蔡志祥（2003）的〈汕頭開埠與海外潮人身份認同的建構——以越南西貢堤岸市的義安會館為例〉雖然是討論越南的潮州人，但是也明確指出，東南亞的方言群認同往往與殖民地政府對人群的管理有關。所謂的客家，在過去的越南指的是寧波、徽州等地的非閩粵人士，而今日所認為的客家人，在當時則被歸類為潮州人。這種做法也可見於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下的台灣客家族群，客家人被歸類為粵人（林正慧 2015）。因此，東南亞客家的形成，也與政府政策息息相關。

以上所提及的文章，都不斷指出政府政策，以及華人在政治與文化上的認同等如何影響客家認同，以及它們和客家認同之間的關係，同時會館也是了解客家認同的重要管道。但是這些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某個時期的討論。至今尚未以同一群東南亞客家人或會館作為個案，探討他們的客家認同如何在華人政治和文化認同的影響之下，隨著時空差異而轉變，以及華人政治和文化認同與客家認同之間的關係。

王賡武（Wang 1985）曾經指出，東南亞華人認同非常多元，並且深受種族、政治、經濟與文化四個層面的影響。東南亞華人認同在這四個層面不斷來回激盪，並且隨著時空的變化而有所差異。因此在討論東南亞客家認同的變化，必須顧及華人多元認同

對於客家認同的影響。

在這四個層面之中，政治和文化不但影響了華人認同，也影響了東南亞客家認同。東南亞現代國家的成立，導致當地華人的政治認同有所變化，進而導致東南亞客家人的認同邊界也有所變化。因此政治認同深刻影響了東南亞的客家認同，所以東南亞客家人如何想像自己是客家人（也就是客家認同）也可從『想像的共同體』（Anderson 1983）切入。

另一方面，東南亞客家人的語言、文化和歷史等文化因素不但是形塑客家人認同的重要因素，同時這些也是影響東南亞華人文化認同的重要元素。因此，文化不但影響了東南亞華人的認同，也影響了客家認同。所以東南亞華人在文化認同方面，是否與東南亞客家人的文化認同的重疊情況，也必須列入思考之中。

綜上所述，在討論東南亞客家認同時，必須思考當地華人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影響，以及它們和客家認同的關係，檢視它們與客家認同之間的重疊與分離。此外，東南亞客家認同與東南亞華人認同一樣是多元的，所以在以某一群客家人或會館進行討論時，必須知道這只是東南亞諸多客家認同的一種，而不是唯一一種。

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是客家人的重要組織，也是研究客家認同的重要媒介。會館在城市的華人社會和海外華人社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時甚至成為了當地華人商業貿易的場所（Goodman 1995）。在東南亞華人史上，一個華人必須藉由團體的力量才能夠順利在當地生存與紮根。因此，個人參加會館並通過同鄉的力量融入東南亞當地，成為了十九和二十世紀的東南亞華人社會中很常見的現象，同時東南亞各地大大小小的華人會館，也因此成為了各地華人的代表（Kuhn 2008）。

因此，如果要探討東南亞客家認同，東南亞當地的客家會館是個適合的切入管道。在有關東南亞華人會館的研究中，大多把會館放入東南亞華人史的脈絡中來討論，但把會館放入東南亞史的框架中來討論的不多。有關東南亞客家的研究中，也大多從東南亞華人史，或者就客家會館本身來討論(林開忠 2013: 114-130; 利亮時 2011: 65-85; 黃淑玲、利亮時 2011: 114-130; 蕭新煌、張維安等 2005: 185-219)。所以本文試圖從以一家東南亞的客家會館作為例子，來探討當地的客家認同。

為集中討論，本文以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為討論個案。南洋客屬總會於 1929 年在新加坡成立，是香港到東南亞地區的客家組織領頭羊。隨後南洋客屬總會經歷新加坡從英國殖民地變成馬來西亞的一部分，到後來新加坡獨立建國，其客家認同也因此隨著當地華人的政治和文化認同有所變化，並且這客家認同與華人文化和政治認同之間的關係也不斷改變。因此其流露出的客家認同，以及它和華人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間的關係值得注意。

在這段時間內，南洋客屬總會出版了五本會刊(分別是在客屬總會十週年、35/36 週年、六十週年、七十週年和八十週年出版)，這些會刊的出版除了慶祝其成立之外，其中部分會刊也是因當時南洋客屬總會本身的重要事件而配合出版。因此，這些會刊的內容凸顯了南洋客屬總會在不同時期的客家認同，以及客家認同如何受到華人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的影響，以及它們與客家認同的關係。因此，本文將按照時間順序，詳細分析這些會刊的內容與其結構，來得知其中所反映的客家認同、東南亞華人的政治和文化認同如何影響東南亞客家認同，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同時客家認同的變化過程，又如何反映了當時正在進行的國家塑造過程與國家社會工程。

二、客屬總會的成立

客屬總會成立於 1929 年 8 月 23 日，但是其成立卻籌備了六年之久。根據《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特刊》所言，1900 年時，華人義山青山亭的土地被英殖民政府要求收回並劃入市區，另做發展用途。原先政府答應給予廣客兩幫另一片土地作為補償，但是在多年後仍未給予。因此，幾位客家和廣東領袖在湯湘霖和邱雁賓的帶領之下追討，於是英殖民政府另外撥地於客家與廣東社群，作為徵收土地的賠償（賴涯橋編修 2009[1939]：75-78）。

客家人從英殖民政府處取得 6,670 平方英尺的土地（當時殖民政府一共給予了 20,000 平方英尺的土地），並且客家領袖們針對如何使用這塊土地在 1923 年召開會議商討。在湯湘霖的建議之下，決定仿效漳州十屬會館和潮州八邑會館那般，成立客家聯合團體——也就是客屬總會（1948 年時才改稱南洋客屬總會），並且利用從政府取得的土地來蓋這新團體的會所。這建議獲得嘉應五屬與豐永大共八屬所召開的大會通過後，把籌備處設在應和會館（賴涯橋編修 2009[1939]：75-78）。

但是這計劃也一波三折。當新加坡嘉應與豐永大共八屬的同僑大會在 1923 年一致同意這項決定之後，開始積極籌備成立團體與建立其會所之事。除了新加坡當地客家人之外，同時也到馬來半島向各地的客家社群募款，但是款項仍然不足。最後經由胡文虎的幫助，向四海通銀行借款，客屬總會的會所才於 1926 年開始動工。最後，客屬總會的會所終於在 1928 年落成，並且在 1929 年宣告開幕，也在同年成立客屬總會（賴涯橋編修 2009[1939]：75-78）。

雖然說是模仿潮州和漳州的團體，但是實際上客屬總會卻與

這兩個團體十分不一樣。潮州八邑會館和漳州十邑會館是以中國同一省的原鄉地域作為組成概念（也就是地緣團體），但是客屬總會卻是一個跨越原鄉地域，以方言群作為組成概念的團體。客屬總會在籌備成立時，應和會館、豐順會館、永定會館、茶陽會館、惠州會館和三和會館等共六個會館以特別贊助團體的身份參與（賴涯橋編修 2009[1939]: 79）。這些團體個別上可被視為是地緣團體，但是它們在地域概念上並非來自同一個地方，而是分別位於福建與廣東兩省的不同區域。它們唯一的共同點是，都被當時其他團體視為是客家人所組成的團體。

雖然在這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有以方言群作為組成概念的客家團體，例如成立於 1892 年的瓜拉立卑客屬公會（原名客社會館）和 1886 年成立的山打根客屬公會（原名鵝城會館），但是它們是以會館所在地的客家人作為核心的方言群團體（客屬總會編輯委員會 1967: A39；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 2006: 98-103, 106-112），甚至後者最初只招收當地惠州客家人為會員，隨後才擴大招收所有山打根當地的客家人成為會員（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 2006: 98-103）。相比之下，客屬總會不但是以方言群作為組成概念（都是客家人團體），同時也是超出原鄉區域（橫跨福建與廣東兩省的多個客家地區），以及超出其會館所在地範圍的團體（不只是新加坡，也包括了當時馬來半島上的客家人）。

所以，客屬總會不但不同於以往建基於地緣、血緣、業緣、學緣或神緣的團體，而且是一個直接以方言群作為認同，以已有的地緣團體（例如新加坡應和會館和永定會館等），作為自己成立基礎的跨地域團體。換言之，它是個開先例的社團組織，不只是一個團結新加坡原有的客家會館和客家社群的組織，同時也是一個橫跨東南亞各地的跨地域組織。

此外，客屬總會也與其他團體不大一樣。它並非是先有團體再來籌劃會所等事情。而是因為 1920 年代新加坡客家社群正好有一片土地，然後客家社群的各個會館領袖在討論之後，決定共同成立一個客家聯合社團，因此才成立了客屬總會。所以，客屬總會的成立，是恰好碰上當時新加坡客家社群有資源，同時當時南洋客家的認同意識已經逐漸形成，才促成客屬總會的成立（蔡志祥 2003：502-520；施添福 2013：1-56；施添福 2014a：1-114；施添福 2014b：1-110）¹。

客屬總會在 1937 年時，以團結各地的客家人為目標，因此除了招攬原有的東南亞各地的客家會館加入成為其團體會員之外，也積極在各地推廣客家會館的成立。到 1939 年為止，一共促成了近 40 間客家會館的成立。這些客家會館成立的原因，除了是客屬總會的積極推動以及客家認同意識已經成型所導致之外，這背後也是因為胡文虎嘗試以客家作為號召，建構自己的勢力所導致（黃力堅 2012：3-51）。

胡文虎一直不斷地擴張自己的商業帝國與影響力，其中客家是他的重要媒介之一。1923 年，胡文虎在新加坡設立永安堂分行，並且在 1926 年把總部自仰光搬遷至新加坡，並且在新加坡設立製藥廠。除了借助新加坡客家人網絡來打入新加坡醫藥市場之外（沈儀婷 2013：34-44，279-286），同時胡文虎也積極在新加坡華人社會中活動，以建立個人的名聲與商業王國。其中參與並推動各地客家會館的建立，對於胡文虎本人都有所幫助。例如在 1930 年代，胡文虎除了聯合霹靂當地的客家領袖（都來自福建永定胡氏宗族），推動了霹靂客屬公會的成立之外，同時他也與當地的客家領袖胡重益共同合作，在 1934 年時一同在在彭亨州立卑成立胡兄弟

¹ 東南亞客家意識的形成，除了因為僑居地政府的治理方式與僑居地社會變遷，也因為客家原鄉的發展所導致。

水力金礦公司 (Foo Brothers Hydraulic Gold Mine Limited) 開採金礦，並且大獲成功 (《南洋商報》 1936: 8; *The Straits Times* 1934: 13;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934: 3)。因此，擔任客屬總會第一任會長的胡文虎，支持客屬總會的成立不只能夠建立起他在客家幫群中的領袖地位，提升自己的名聲，同時也可藉此拓展自己的商業網絡，壯大自己的商業王國 (賴涯橋編修 2009[1939]: 75-78)。

因此，客屬總會的成立，是由於南洋地區的客家認同已經漸漸形成，以及胡文虎意欲以各地的客家會館，來建構自己的勢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屬於跨地域方言群團體的客屬總會於是成立，成為當時各地客家組織的領頭羊。

三、『我們是中國人』：《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特刊》

客屬總會的第一份紀念刊——《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特刊》(以下簡稱《十週年特刊》)，是在其十週年時(1939年)所刊行。現今流傳的《十週年特刊》是賴涯橋的推動下，由客屬總會在2009年推出的復刻版。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東南亞的華人民族主義是個熱烈高漲的時期。自十九世紀末開始，由於中國清政府對於海外華人的日漸重視，以及康有為等為首的保皇派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在海外華人中積極宣傳而獲取熱烈支持，使得中國民族主義在東南亞華人社群中茁壯成長。二十世紀初，從孫中山所成立的同盟會到中國本土一連串的政治與社會事件，都不斷引起東南亞華人群體的關注與回應。他們不但主張積極參與中國本土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活動，同時這些舉動也刺激了東南亞華人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雖然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內部有所差異，例如清

末時期的立憲派和革命派之間的競爭，到國共兩黨互相競爭，但是都吸引不同的海外華人參與；同時即使存在這些差異，整體上這些人都認為自己是中國的國民。到了二十世紀，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主流，並且由於中國政府在國籍法上採取血統主義，許多東南亞華人不但視自己為中國國民，同時也自動成為了中國國民(李盈慧 1997; 王賡武 2007; Tarling ed. 1992: 310-313)。

1939年時，中日戰爭已經進行了兩年。由於東南亞的華人民族主義的影響，促成東南亞許多華人響應中國政府與僑居地當地華社領袖的號召，熱烈捐款資助中國政府對抗日本。客屬總會也不落人後，不但積極籌募款項，也在創立十週年時舉辦為期五天的遊藝會，除了藉此紀念會慶之外，同時也為籌賑中國難民募款(賴涯橋編修 2009[1939]: 28)。因此，《十週年特刊》的刊行，不但紀念創會十週年，也為當時中國的抗戰募款，並且為此留下記錄。

當時的客屬總會也藉此機會來召開大會，討論自身的未來發展。1938年，客屬總會在胡文虎的倡議下，決定在南洋各處推廣與設立客家公會。這除了是為了團結當地的客家人之外，同時也作為客屬總會的支會。當時客屬總會的董事會認為，客家人分佈南洋甚至亞太各地，但是缺乏機構把各地的客家人組織起來。因此，希望借助推廣並在各地設立客家公會，並且團結在客屬總會之下，以達成幫助籌賑中國難民、幫助南洋各地的客家同胞，並且協助南洋各地的客家人在工商業上互助與共同投資。經過大半年的努力，客屬總會在各地開設了多個客家公會，再加上一些已有的客家公會，趁著客屬總會十週年會慶的時候召開大會，共同商討未來的發展以及如何籌賑中國難民(賴涯橋編修 2009[1939]: 89-90、96)。

《十週年特刊》的內容處處可見濃厚的中國政治色彩，流露出強烈的中國政治認同。在〈照像〉部分中，最前面的三張照片分別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當時的國府主席林森以及當時中國的實質元首蔣介石的照片，隨後則是客屬總會的創始功臣等人的照片（賴涯橋編修 2009[1939]：7-24）。可見在當時客屬總會的眾人心中，認為中國是自己的祖國，自己是中國的國民。此外，這些對中國的認同並不與客家認同相衝突，甚至互相包容與刺激。

在〈題詞〉部分，對中國的政治認同色彩更是濃厚。在眾多題詞之中，有不少是民國政府官員的題詞，例如林森、蔣介石、孫科、閻錫山、高凌百等人。此外，題字的內容也多提及祖國，或者認為南洋的客家人也是中國人。例如林森當時寫的『團結精誠愛護鄉國』、星洲禾公山會題『顧鄉救國』等，都一再顯示當時的客屬總會的國家認同是中國（賴涯橋編修 2009[1939]：35-65）。

《十週年特刊》也可看見當時華人對中國的政治認同，是如何深刻影響了當時東南亞的客家認同，並把兩者畫上了等號。當時的人們認為，客家人也是中國人，而這在《十週年特刊》的〈客屬團結與民族團結〉一文中表露無遺。這篇文章指出，客家人來自中國北方，並且因為語言的差異，在中國南方自成一系。這些都一再聲明客家人是中國人的一部分。隨後，在後段中指出，南洋地區分幫派（方言群）是為了行事方便，而這也成為慣例。作者認為這不但不礙於華人團結，並且方言群內部的小團結，才能促成全體華人的大團結。從這篇文章可見，當時的南洋客家人認為自己不但是中國人，客家人的認同與團結，也是認同中國與團結中國人的重要管道。先要團結客家人，才能夠團結中國人；認同自己是客家人，也就是在政治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賴涯橋編修 2009[193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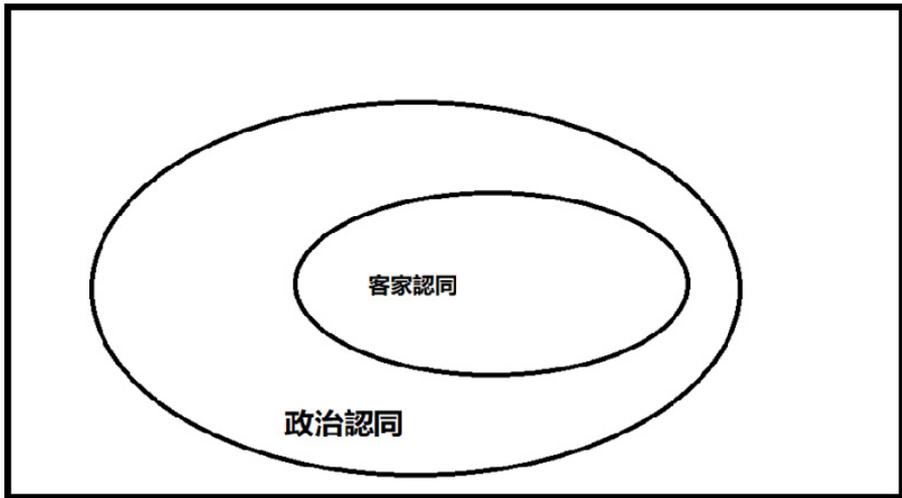


圖 1：南洋客屬公會 1939 年時的客家與政治認同
資料來源：筆者繪

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同時也隱藏了胡文虎與陳嘉庚之間的紛爭。由於陳嘉庚當時領導新馬華社，為籌賑中國難民與資助中國抗戰而努力。向來與陳嘉庚不和的胡文虎，不願意因此而聽從陳嘉庚的指揮，因此另外通過客屬總會來募款救助中國難民與支持抗戰，來與陳嘉庚領導的籌賑活動相抗衡。此外，自 1938 年起，胡文虎積極推動客屬總會在各地成立分會，目的之一就是為中國募款，更是可見他不願在為中國募款一事上屈居於陳嘉庚之下，而另外通過客屬總會與其分會，向南洋客家人募款來達成自己的目的（黃力堅 2012：3-51）。同時在無形中，促成了客家人認同與中國政治認同趨同。

四、新馬人/南洋人：《南洋客屬總會卅五、六週年紀念刊》

雖然《南洋客屬總會卅五、六週年紀念刊》（以下簡稱《卅五

六週年特刊》)是為了慶祝南洋客屬總會會慶而在 1964/5 年所決定出版的刊物，但是實際上出版年份是 1967 年。有如此延誤，是因為出版《卅五六週年特刊》的決定，是在 1964 年的第五屆代表大會上才決定，並且因印刷問題而延遲出版，所以從原先的《南洋客屬總會卅五週年紀念刊》改為《南洋客屬總會卅五、六週年紀念刊》(南洋客屬總會編輯委員會 1967：A47-48，118)。

從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到 1967 年《卅五六週年特刊》正式出版的這段時間，新加坡處於一個政治歸屬不斷變化的階段。二次大戰結束後，東南亞各個國家都展開自己的獨立運動，這也包括了新加坡和馬來亞的獨立。英國統治下的馬來亞在 1957 年正式取得獨立地位，位於其南方的新加坡在 1955 年取得自治邦的地位。1959 年，取得新加坡自治邦政權的人民行動黨，認為必須要和馬來亞聯合，才能從英國手中取得獨立地位。馬來亞也同意這個做法，因為這做法可以抵抗共產勢力對東南亞的滲透，避免讓新加坡被共產化，變成第二個古巴，並威脅自己的安全。除了馬來亞和新加坡，這個新國家也將包括了砂勞越、沙巴和汶萊五個曾經隸屬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最後，汶萊不加入，而其餘四地在 1963 年組成了馬來西亞。雖然新加坡在倡議時非常贊成加入馬來西亞，但是由於李光耀和東姑阿都拉曼的意見分歧，最終導致新加坡在 1965 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成為新加坡共和國 (Tarling ed. 1992: 611-614)。

此外，由於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並且在 1949 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政權，使得中國與東南亞的聯繫減少，東南亞各地的華人社會的政治認同也因此改變。當時的全球冷戰思維以及東南亞各國政府對於共產勢力的滲透感到恐懼 (當時各國都受到了共產黨不同程度的抗爭的影響)，導致中國共產黨控制的中國大陸與新馬等東南亞地區的正式接觸大量減少。此外，中共政

府總理周恩來在 1956 年接待新馬兩地的考察團時，也不斷鼓勵新馬華人放棄中國國民的身份並成為東南亞當地的公民。這說法不但獲得新馬華人領袖的支持，並且當時許多新馬華人也申請成為公民，印證了當時新馬華人的政治認同也逐漸轉向了新馬本土，而不再是中國（Hara 2003；崔貴強 2007）。

在這段期間，客屬總會也有所變化。在 1948 年時，客屬總會的特別會員大會上通過，授權董事會在客屬總會前加上『南洋』二字，以使得名實二者相符（吳慧娟 2008：102）。此外，南洋客屬總會也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走向獨立期間，積極為新馬華人爭取公民權（1957 年），並且也為此辦理公民宣誓、填寫申請表格等等（1958 年）。除了為客家人在政治上爭取公民權，南洋客屬總會也在社會事務上盡一分力。例如在 1958 到 59 年之間，南洋客屬總會聯合其他會館，積極要求新馬電台分家之後，新加坡電台繼續保留客家等方言的廣播節目。另外，也可看到南洋客屬總會為各地的屬會籌款建立會所，並且積極推動各項會務的擴張（南洋客屬總會編輯委員會 1967：A40-43）。更為重要的是，南洋客屬總會自二戰結束後，不再關注和參與與中國有關的事務，與中國相關的事務非常罕見於會務中，反而活動更加集中在新馬等地的客家相關事務。

1945 到 1965 年間的政局變化非常繁複，並且新馬華人的國家認同也因此而有所改變，這些改變也表現在《卅五六週年特刊》中。雖然政治上的認同從中國移往新馬本土，但是並不意味著對中國的政治認同就完全消失。許多人對於中國的認同主要不再是政治認同²，而是體現在文化的認同上。換言之，在過去的華人認

² 政治上對中國的認同並非馬上完全消失，而是變得較為隱晦，對中國的認同多以文化的形式來表達。這是因為華人在政治上奉行實際主義，以選取當下對自己最為有利的選擇或者不表態，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Wang 1970）。因此選擇認同當地而不認同中

同中，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偏向中國的，但是到了戰後，中國元素主要體現在文化上。中國元素在政治上已經變得十分邊緣，並且在政治認同上也逐漸在地化。

文化認同中帶有中國元素並非這時才出現，在 1960 年代之前就有這種思維。王賡武（Wang 1985）指出，在二戰之前，華人認同中的政治與文化認同中帶有中國元素。其中文化認同是從歷史與文化出發，來顯示對於中國的認同。因此，在 1960 年代的轉變，實際上是把以往的在文化認同中的中國元素放大，以及把政治認同中的中國認同淡化與轉向本土。

在《卅五六週年特刊》中，第一頁就顯示了對新加坡本土的政治認同。第一頁上，印著當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照片，並且也特別註明李氏也是客屬總會的名譽顧問（南洋客屬總會編輯委員會 1967：圖片）。此外，由於李光耀是客家大埔人，因此南洋客屬總會在政治上是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的忠實支持者。因此，從《卅五六週年特刊》放入李光耀的照片來看，南洋客屬總會在歸順與推動新的政治認同上，可說是當時的先鋒。

其實，這種做法和《十週年特刊》的做法一致。但是當時所放的照片是孫中山、蔣介石等中國政治人物的照片，反而屬於新馬地區的政治人物付之闕如（英國國王和新加坡總督等照片完全沒出現）。可是在二十八年後的會刊中，中國政治人物的照片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本土的政治人物，這顯示他們在政治範疇和國家認同上，已經把目光從中國轉向了本地（Hara 2003；崔貴強 2007）。³

國，是 1960 年代在新馬來兩地的最佳選擇。

³ 但無法確定的是，會刊中所顯示的從認同中國政權到認同新加坡本土政權的轉變，背後是南洋客屬總會的主動改變，或是有其實際考量與壓力所致。

雖然會刊中的一些內容仍然顯示了對於中國的認同，但是這些認同主要是源自文化與歷史。在許多篇幅中，有許多在介紹中國客家鄉區的部分。例如有關大埔地區史地的相關介紹，以及豐順與赤溪地區的著名景點的簡介等（南洋客屬總會編輯委員會 1967：A31-37，63，68）。這些與中國有關的內容，可視為是南洋客家人對於故鄉的想像，並且以其歷史和文化作為其認同的象徵。此外，另一些與中國相關，但是與新馬幾乎沒有關係的客家人也在這本紀念刊中出現。例如張翱儀和範萸香，他們和南洋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因為是客家地區的名人，而得以出現在會刊之中（南洋客屬總會編輯委員會 1967：A110-112）。雖然如此，但是從結構上來說，這些內容不是因為中國政治認同而出現。它們所代表的是與文化和歷史較為有關、並且與國家認同不衝突的文化認同。

另一個不同的是，這本紀念會刊中創造出專屬於香港與東南亞地區的客家人的客家認同。〈屬會會史〉中所記錄的屬會就包括了香港的東南亞各地的客家會館，顯示了南洋客屬總會所顯示的客家認同的範圍是跨越香港和東南亞等地、跨越國界的（南洋客屬總會編輯委員會 1967：A123-148）。在〈先賢傳記〉中，記錄了羅芳伯、張弼士和葉亞來等人的生平。這些人都是從中國南來，並且在新馬地區開墾從商而致富的客家人。這些人與中國的關係較少，但是和新馬的關係較為密切（南洋客屬總會編輯委員會 1967：A77-98）。同時在〈屬賢紀勳〉中，記錄了還在世的客家名人的傳記，例如張夢生（當時南洋客屬總會的會長）、胡蛟、胡清才、劉伯群等人（南洋客屬總會編輯委員會 1967：A113-122）。這也顯示了凸顯新馬客家的名人之外，同時也顯示新馬客家人已經有足夠了資源可獨當一面。另外，也不再局限於對於富商或著名人士的介紹，《卅五六週年特刊》中也出現了〈屬人生活〉這部

分，專門講述東南亞和香港客家人的概況和生活（南洋客屬總會編輯委員會 1967：A149-178）。這些內容都不見於《十週年特刊》，並且也顯示這時候的客家人在製造屬於本地（香港與東南亞）客家人的共同故事與記憶，而這是不同於也不屬於中國本土的客家人的。

綜上所述，《卅五六週年特刊》顯示了南洋客屬總會所代表的客家人在認同上的轉變。在政治認同上，他們如同當時其他新馬華人一樣有所變化。在戰前，他們在政治上所認同的國家是中國，但是到了 1960 年代時，他們所認同的國家已經變成了他們所居住的國家。

另一方面，在客家認同上也有所變化。在戰前，他們認為自己是客家人的同時也是中國人，中國政治認同和客家認同是共同的（或者說客家元素隸屬於中國元素這一範疇中）。但是在《卅五六週年特刊》中，南洋客屬總會為其組織名字加上了『南洋』一詞以顯示自己是以南洋為其組織的地理範疇（從其會刊的內容來看，此『南洋』包括了今日的香港與東南亞），並且其中也開始製造南洋客家人專屬的客家論述，凸顯了自己身為南洋客家人的文化與身份認同。

但是另一方面，當時的南洋客屬總會仍然是一個超越國界的組織，因此南洋客屬總會所顯示的客家認同，並不與國界一致。在這時，他們所顯示的華人文化認同雖然不與政治上的國家認同相衝突，但是文化認同上也包含了許多與新加坡或馬來西亞所不具有的因素，例如香港客家人的生活特色，而是自外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化因素。因此，政治和文化認同兩者也並非完全重疊。另一方面，客家認同雖橫跨香港與東南亞，但是不包括原鄉，因此與包括原鄉、香港與東南亞的文化認同也不完全一

致。換言之，這時期南洋客屬總會所流露出的認同是多重的，雖然同時出現了客家認同、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但是客家認同是跨越國界，橫跨香港到東南亞的諸多地域，但不包括中國原鄉的客家人；文化認同的因素不只是包含了原鄉文化與歷史，也包含了活躍於東南亞的客家名人事蹟；政治認同上，則是不與前兩者完全重疊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這些認同，不但顯示了東南亞華人認同的多元，也顯示了當時東南亞客家人的認同的跨域性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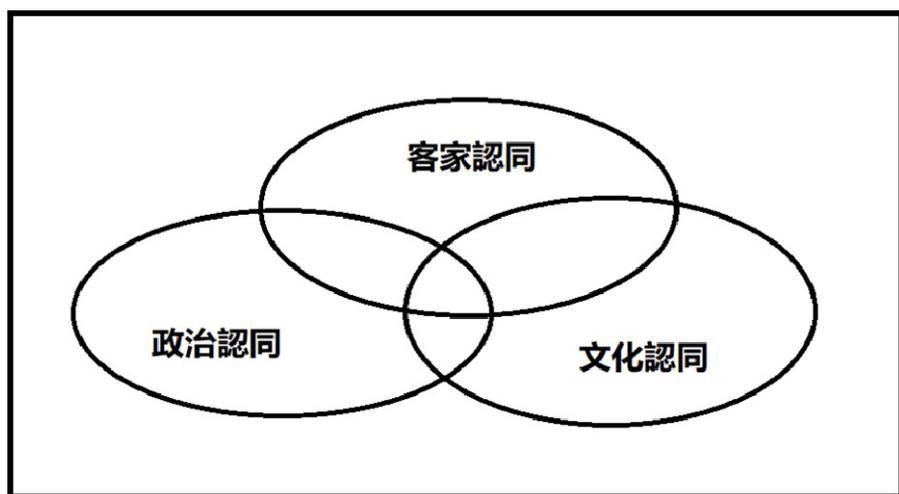


圖 2：南洋客屬總會在《南洋客屬總會卅五、六週年紀念刊》中所體現的客家、文化與政治認同
資料來源：筆者繪

五、新加坡人：60、70、80 週年會刊

在新加坡獨立的 1965 年之後，南洋客屬總會分別在會慶的六十（1989 年）、七十（1999 年）和八十週年（2009），分別出版了《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以下簡稱《六十週年特刊》）、《南洋客屬總會七十週年紀念特刊》（以下簡稱《七十週年特刊》）和《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八十週年紀念特刊》（以下簡

稱《八十週年特刊》)。

《六十週年特刊》在 1989 年出版，除了這是其一甲子的會慶，同時也趁此舉辦世界客屬聯誼大會，邀請香港、馬來西亞、台灣、印尼、泰國與中國等地的客家會館代表齊來赴宴一同慶祝（陳松沾主編 1989：153-154）。因此，這本會刊再現了《35/36 週年紀念特刊》中眾多會館齊賀的熱潮。從《六十週年紀念特刊》的《本總會歷史沿革（1929-1989）》的內容來看，可發現從戰後早期到 1965 年新加坡獨立前，南洋客屬總會積極從事新馬的社會活動，可是自此以後（特別是自 1970 年代起），對於社會事務的參與度下降許多，記錄的活動也只是發放獎學金與敬老度歲金，以及舉辦會慶等（陳松沾主編 1989：60-62）。

雖然如此，南洋客屬總會在文化上的努力仍然頗見規模。在會刊中多達一半以上的頁面與客家研究有關，這包括了〈客家源流考探〉、〈客家精神與文化〉、〈客家語言研究〉、〈客家歌謠和漢劇〉、〈客家先賢與人物〉、〈客家民俗研究〉，以及〈論述機其他附錄（包括了客家文教與新加坡客家人行業）〉等七個部分（陳松沾主編 1989：171-457）。主編陳松沾指出，這些文章是他自眾多文章中挑選出來，以顯示客家研究的發展，並推動客家研究的進一步發展（陳松沾主編 1989：458）。這顯示了雖然南洋客屬總會在新加坡華人社會方面的影響力不如以往，但是在文化上仍然積極發揮影響力。

《七十週年特刊》在 1999 年出版，除了延續南洋客屬總會每逢十年舉辦一次盛大會慶之外，也藉此為擴建客總大廈籌款（南洋客屬總會 1999：56）。除了把原先五樓的天台改成辦公室、擴建後的六樓作為涼亭與花園外，同時也把五樓出租給商業機構以改善財務狀況（南洋客屬總會 2009：40-43）。《七十週年特刊》的

內容結構與《六十週年特刊》相似，大半本的內容都與客家研究相關，其中包括了〈客家文化〉、〈客家人與國家建設〉、〈客家先賢與我會人傑〉，以及〈論述及附錄〉四部分（南洋客屬總會 1999：68-157）。但與《六十週年特刊》不同的是，《七十週年特刊》較為注重客家女性的相關內容，同時也開始關注客家人在中國與東南亞政治上的角色。

《八十週年特刊》與前兩本會刊相比，更為強調本土色彩，以及南洋客屬總會與屬團和故鄉的聯繫。除了固有的發刊詞、獻詞、題詞和賀詞，以及會務和會史之外，《八十週年特刊》也另闢篇章介紹了屬團（南洋客屬總會 2009：44-47），甚至特別介紹了豐永大公會、茶陽大埔會館、豐順會館、永定會館、應和會館、惠州會館以及廣西暨高州會館等七客家會館（南洋客屬總會，2009：106-121）。會有如此安排，除了這七家會館是新加坡客家的重要會館之外，也是歷史最為悠久的屬團。其中除了豐永大公會之外，它們是南洋客屬總會成立時的特別贊助團體。除此之外，也特別介紹了大埔、豐順和永定三個祖籍地（南洋客屬總會 2009：122-129），以及新加坡客家行業和教育發展史（南洋客屬總會 2009：132-169）。

此外，在〈專稿〉部分，也特別收錄了有關東南亞華人文化與東南亞的文章【〈推廣化組文化邁入新紀元〉（南洋客屬總會 2009：66-71）和〈中華文化的南播與東南亞華文文學母題〉（南洋客屬總會 2009：76-85）】、新加坡客家研究介紹【〈同本地客家人足跡的歷史典藏：南洋客屬總會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首辦新加坡客家研究論文發表會〉（南洋客屬總會 2009：72-75）】，以及賴涯橋四篇講述客家人精神、商業和社會的文章【〈從新加坡客屬會館的變遷和發展看客家人在經濟全球化環境下的自我轉型和創新變革〉（南洋客屬總會 2009：86-91）、〈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

香自苦寒來：梅花與客家人的情操》(南洋客屬總會 2009：92-95)、〈山歡水笑迎客來，齊心合力譜新曲：2009' 梅州·世界客商大會紀實》(南洋客屬總會 2009：96-101)，以及〈客家的動力與梅州的社會轉型》(南洋客屬總會 2009：102-105)】。這些篇章的安排，顯示了《八十週年特刊》再次注意到了新加坡客家人與其他地方的聯繫之外，也開始認為推廣華人文化是客屬總會的會務之一，無形中默認了客家文化是華人文化的一環。

南洋客屬總會在 1965 年之後所出版的三本會刊的內容，反映了新加坡在 1965 年之後的政治變化。1965 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成為新加坡共和國。這個變化最初並沒有造成直接立即的衝擊，但是由於新加坡作為一個新的主權國家的事實，以及不斷地強調新加坡的國家認同概念，也慢慢地影響並改變了新加坡的社會團體。

1973 至 1975 年間，新加坡政府的法令變化，導致南洋客屬總會旗下的非新加坡本地的屬會，不再是南洋客屬總會的會員。1973 年，由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法令互有抵觸，因此海外的屬會不再選派董事代表。1975 年，南洋客屬總會按照社團註冊法令，取消了外埠董事代表。自此南洋客屬總會成為了新加坡客家團體的總會而已，不再是東南亞與華南地區的客家團體總會（陳松沾主編 1989：61）。

自此，南洋客屬總會的客家認同的想像空間，從 1960 年代時的橫跨東南亞與香港的客家人認同，演變成以新加坡為界線的客家認同而已。即使最為接近的馬來西亞，也自此排擠在新加坡客家人的想像之外，不再認為自己和他們同屬一個客家人群體，而是各自獨立的群體。換言之，如果從家族分家的觀念來看，新馬的客家認同一分為二，變成了新加坡客家和馬來西亞客家，從以

往的同一家人，變成了兩家人。南洋客屬總會旗下的團體會員，只剩下了新加坡本地的客家會館。自此以後，南洋客屬總會的會刊中所列出的團體，就只有新加坡本土的客家會館。以前是南洋客屬總會的屬會、但是不在新加坡本土的團體會員，與南洋客屬總會再也沒有任何從屬關係。因此，南洋客屬總會自 1970 年代起出版的會刊所顯示的客家認同，都以新加坡的國界為客家認同的想像邊界，所出版的會刊所顯示的客家認同與政治認同相互重疊。

此外，在東南亞現代國家的建立，新加坡客家與其他地方的客家分道揚鑣之餘，新加坡的客家團體同時也必須面對新加坡政府對於方言群認同的打壓，以及客家認同的淡化。新加坡國家自建國開始，許多以往會館提供的社會功能，就由各種國家機構所取代。這變化也體現在南洋客屬總會自 1965 年以後，社會事務的參與度下降許多。同時新加坡政府也推行打壓方言的政策，例如禁止媒體使用方言等等，使得新加坡各個會館日漸走下坡，客家認同隨之萎縮（黃淑玲、利亮時 2011）。再加上由於新加坡政府不斷強調華人作為一個群體並且加強了以華語作為華人的共同語言，進而助長了華人認同，也使得客家認同隨之萎縮（Hsiao and Lim 2007）。

雖然 1985 年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成立，有助於會館的再興，但是會館在新加坡的地位與影響力仍舊不如以往。新加坡獨立後，會館的功能主要是在文化推動方面，並且不再具有顯著的社會功能（黃淑玲、利亮時 2011；Hsiao and Lim 2007）。同時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的建立是在國家機器的許可之下才可成立，並且其目的主要是推廣華人文化以有助於國家發展，因此南洋客屬總會等新加坡會館仍然是在國家力量的掌控之下，並且是國家機器的延伸部分（黃賢強 2011）。

這三本在獨立之後還出版的會刊，恰好是在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成立之後、新加坡政府再度重視新加坡會館的文化功能，以及新加坡政府自 1980 年開始強調儒家文化等政策推行之後（黃賢強 2011）。因此這三本會刊的出現，恰好顯示了新加坡政府的文化政策出與思維的轉變，以及此轉變促成了會館的再興。

在這情況下，這三本會刊的內容都非常強調客家文化，並且認為這是新加坡華人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六十週年特刊》和《七十週年特刊》中與文化有關的內容部分，佔了它們總篇幅的大約一半或以上。而這現象與 1980 年代新加坡政府再度重視會館的文化特性與功能，以及南洋客屬總會也希望藉由注重文化，來突顯自己的地位有關。自此，南洋客屬總會所顯示的認同，不但新加坡客家人的客家認同與國家認同重疊，而且在文化認同上，也認為新加坡客家文化是新加坡華人文化的一部分，客家認同與文化認同也相互重疊。

南洋客屬總會的六十、七十和八十週年紀念刊的內容，也可看見越來越凸顯新加坡客家的傾向。在《六十週年特刊》中，共有八十幾篇客家研究，但是其中與新加坡客家相關的客家研究卻只有八篇（陳松沾主編 1989：175-457），只有總數的十分之一。在《八十週年特刊》中，雖然不像《六十週年特刊》那般收集了涵蓋各方面的客家文章，但是其中與客家研究相關的〈客家行業〉，只集中在講述新加坡客家行業和教育的發展史（南洋客屬總會 2009：132-169）。

從漫談各方面的客家，轉向以新加坡客家作為論述主題，也與新加坡客家研究興起息息相關。2007 年，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賢強開設的研究生課程——『東南亞華人專題研討：新馬客家族群與社會』中，即以新加坡客家作為課程主題，帶領

學生仔細研究新加坡客家人。同時也在期末時舉辦研討會，由研究生們輪番上台發表研究成果。隨後這些論文也在修改之後結集出版，即《新加坡客家》與《新加坡客家文化與社群》二書（南洋客屬總會 2009：74-75；黃賢強 2007；黃賢強 2008）。雖然新加坡客家研究對新加坡客家認同是否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仍然有待深入探討，但是這些研究無疑對於新加坡客家認同的塑造提供了資源。

除此之外，也可從南洋客屬總會在新加坡獨立之後出版的三冊紀念刊，發現新加坡客家人與中國客家原鄉的關係變化。在《卅五六週年特刊》之中，雖然有些篇幅介紹中國原鄉的風景與史地，但只佔了全書不到十頁。這很可能與當時冷戰所導致中國大陸與東南亞之間的聯繫微弱有關。在《六十週年特刊》和《七十週年特刊》中，對於原鄉的介紹則完全缺乏。雖然兩本紀念特刊之中有好些有關客家研究的文章，並且論及中國本土的客家人，但是這些文章所談的主要是客家如何從北方遷移到中國南方，或者客家的文化與語言特色等等，具體的客家原鄉的介紹則付之闕如（陳松沾主編 1989；南洋客屬總會 1999）。

但是，在《八十週年特刊》中，對於原鄉的介紹又再度回到會刊的篇幅之中。在這本會刊中，介紹了大埔、豐順和永定三個客家原鄉，但是不同的是，對於當地的風景介紹不再像《卅五六週年特刊》那般只是訴諸文字，而是圖文並茂，詳細地介紹當地的人文地理、環境、資源等事物（南洋客屬總會 2009：122-129）。此外，雖然《八十週年特刊》再度強調了和祖籍地的聯繫，但是這不再是認為是自己的一部分，而是從外來者的角度來介紹這些地方（有些類似教科書式的說明，以及只說好的一面，缺乏表達懷念故鄉之情的語句）。這顯示了這些祖籍地對二十一世紀的南洋客屬總會而言，只是祖先所來自的地方，感情的厚度已經不如以

往。在《八十週年特刊》中的〈土樓新語〉(南洋客屬總會 2009: 170-177), 更凸顯了這些原鄉只是新加坡客家人祖先所來自的地方, 並且與原鄉的客家人只是享有一些文化與精神上享有一些共同點而已。

另一個顯示這種變化的是獻辭與題詞的部分。在《八十週年紀念刊》中, 可以看見中國駐新加坡大使和廣東省省長的獻詞。在之前的紀念刊中, 是沒有這些中國官員的題詞的(南洋客屬總會 2009: 9-10)。這顯示了南洋客屬總會逐漸再和原鄉取得聯繫。

這種變化, 反映了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在這些年的變化。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之後, 由於冷戰的關係, 導致中國大陸與東南亞之間的聯繫日益減少。雖然在改革開放之後, 恢復了與新加坡的聯繫, 但是兩者之間的聯繫費用昂貴, 因此溝通也較少。但是隨著交通日益發達與所需費用不斷降低, 使得新加坡人越來越容易回到中國原鄉參觀, 同時中國原鄉的人也越來越容易到新加坡來, 使得兩者的交流日益增加。這些從中國原鄉新近移民到新加坡的新移民所佔的比例雖然至今仍然不多, 但是不斷成長, 並且他們與中國的關係也影響了南洋客屬總會與中國的互動。在這情形下, 這些新的雙向互動, 使得對於原鄉的介紹又再度回到會刊的篇幅中⁴。

這種轉變並非是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所獨有的。在這段期間, 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也經歷了類似的變化。在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的會刊之中, 從原先強調與原鄉的關係, 轉變成強調了新加坡本土的一面(蔡志祥 2011: 502-518)。可是, 不同於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的會刊所展現的, 新加坡客家人的一部分原鄉——

⁴ 有關新加坡與原鄉之間的關係重新建立, 以及其中的社經關係與身份認同, 可參考柯群英(2013)。

大埔、豐順和永定不但回到南洋客屬總會會刊的內容之中，同時也越來越凸顯新加坡客家認同。會導致前者的發生，是因為國際化與交通發達所導致的現象，但是後者的發生，則是與新加坡認同日益發酵，以及新加坡客家研究的進展，進而加強了新加坡客家人的認同感。

在其他對外關係方面，雖然和其他東南亞地區的客家會館不再具有統屬關係，但是在《六十週年特刊》中，還是可以見到東南亞各地的客家人與南洋客屬總會之間仍然存在良好的關係。例如印尼的雅加達客家人就聯名刊登廣告，恭賀南洋客屬總會六十週年紀念（陳松沾主編 1989：47），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也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恭賀南洋客屬總會（陳松沾主編 1989：45）。此外，當時香港崇正總會理事長黃石華、台灣世界客屬總會會長林保仁、泰國客屬總會理事長丘平遠，以及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理事長黃志仁也在《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中題詞恭賀（陳松沾主編 1989：25-29）。即使時至今日，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各個客家公會之間關係依舊良好。根據筆者自身的田野經驗，新山客家公會在 2013 年柔佛古廟游神期間，就曾邀請了新加坡一些客家會館的合唱團前來演出。

綜上所述，可發現南洋客屬總會在新加坡獨立後在認同上的變化。在客家認同上，雖然仍然與其他地方的客家人和團體保持聯繫，但是受限於國家界限，因此其客家認同與政治認同（認同新加坡）再度重疊。雖然強調客家文化，但是這時期深受政府政策影響，認為客家文化是新加坡華人文化認同的一部分，而使得文化認同與客家認同重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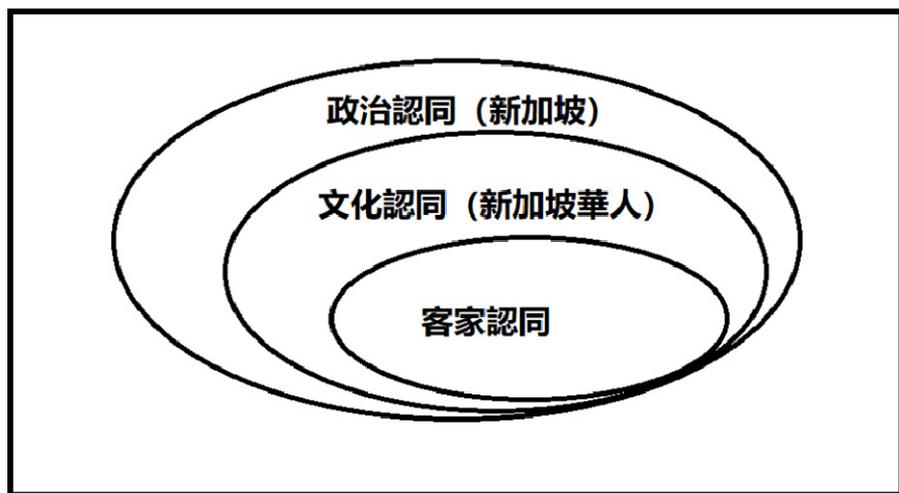


圖 3：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在 1965 年後的客家、文化與政治認同
資料來源：筆者繪

六、代結語

南洋客屬總會從 1929 年到 2009 年之間，一共經歷了英國殖民政府、馬來西亞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等三個政府。從南洋客屬總會的發展和變化來看，南洋客屬總會所主張的客家認同，因為自己所認同的政權變化而有所改變。另一方面，南洋客屬總會的文化認同不但與客家認同有關，也因為政治而有所變化。

從這八十年的變化中，可看出南洋客屬總會所顯示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和客家認同之間的離離合合。在政治認同上，從最初認同中國變成認同所在的國家（新加坡）。這過程中，不但顯示了客家認同深受政治的影響，同時也顯示了一個客家組織如何因應政治認同的變化，以及國家的法律限制，促成自己的客家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關係也不斷改變。

另一方面，客家人在文化認同方面，也並非一層不變。在文

化上，南洋客屬總會在 1960 年代認為，客家文化包括了原鄉帶來的客家文化，以及客家人在當地（香港與東南亞）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當時南洋客屬總會所認為的客家認同只是包括了香港與東南亞的客家人，所以南洋客屬總會的文化認同與客家認同在 1960 年代時是不完全重疊的。到了 1965 年之後，改而認為客家文化屬於新加坡華人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兩者開始重疊了。

從此也可見，南洋客屬總會的客家認同除了由政治和文化的認同來定義，也按照其所設定的屬會地理範圍來界定。因此，政治上從認同中國到認同新加坡，文化則從橫跨原鄉與居住地，到偏重新加坡所在的客家文化。這也反映了南洋客屬總會的客家認同是一直在變動，並深受政治與文化認同的影響。

南洋客屬總會是東南亞眾多客家組織中的一個，並且曾經一度是許多客家會館的領袖。但是由於東南亞華人認同的多元性，使得南洋客屬總會在認同上的變化，只是眾多認同中的一個。可是由於南洋客屬總會過去在東南亞和現在在新加坡的地位，所以它在認同上的變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從它在認同上的變化，可得知東南亞客家認同變遷的一個重要面向。因此，有關東南亞客家認同的研究，有待進一步以個別地區或個別團體進行分析，讓對東南亞客家認同的理解能夠更加細緻與清晰。

另一方面，由於東南亞客家認同與東南亞華人認同息息相關，因此王賡武對於東南亞華人多元認同的理論，為研究東南亞客家認同提供了重要的理解框架，同時在研究東南亞客家認同之餘，也提供一個檢視王賡武的東南亞華人多元認同理論的管道。在本文個案中，可見到文化與政治認同與南洋客屬總會的客家認同之間的互動，但是種族和經濟對於客家認同是否有影響，則有待其他案例進一步來檢驗。但根據現有對新馬方言群的理解，客

家人雖然在某些行業佔據優勢，但是總體而言經濟地位不如福建人，因此經濟如何形塑客家認同是值得討論的。至今為止，認為自己是客家人的，通常也會認為自己是華人，因此種族對客家認同的影響至今為止看似不大。因此，除了種族之外，政治、經濟與文化三者如何形塑東南亞客家人的客家認同，是一個可供未來研究討論的方向。另一方面，本文也無形中檢視了王賡武所提出的東南亞華人多元認同理論，並且顯示在不同的情況下，一些元素可能對一些特定時空下的東南亞華人認同完全不起效用，進而進一步精緻與修正此理論。未來不論是進一步探討如何研究東南亞客家認同，或者檢視與進一步修正王賡武提出的東南亞華人多元認同理論，都有待來者進一步拓展。

參考書目

- 王賡武，2007，《離別鄉土：境外看中華》。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沈儀婷，2013，《譜寫虎標傳奇：胡文虎及其創業文化史》。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客家文化研究室、八方文化創作室。
- 利亮時，2011，〈錫、礦家與會館：以雪蘭莪嘉應會館和檳城嘉應會館為例〉。頁 65-85。收錄於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探究專題中心。
- 李盈慧，1997，《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台北：國史館出版社。
- 吳慧娟 2008，〈獨立前後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的作用〉。頁 93-131。收錄於黃賢強主編，《新加坡客家文化與社群》。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屬總會、茶陽【大埔】會館。
- 林正慧，2015，《台灣客家的形塑過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 林開忠，2013，〈從『客幫』到『客屬』：以越南胡志明市崇正會館為例〉。頁 114-130。收錄於林開忠編，《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 柯群英，2013，《重建祖鄉：新加坡華人在中國》。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新加坡：八方文化。

施添福，2013，〈從『客家』到客家（一）：中國歷史上本貫主義戶籍制度下的『客家』〉。《全球客家研究》1：1-56。

施添福，2014a，〈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2：1-114。

施添福，2014b，〈從『客家』到客家（三）：台灣的客人稱謂和客人認同（上篇）〉。《全球客家研究》3：1-110。

《南洋商報》，1936年9月9日，頁8。

南洋客屬總會編輯委員會，1967，《南洋客屬總會卅五、六週年紀念刊》。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

南洋客屬總會，1999，《南洋客屬總會七十週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

南洋客屬總會，2009，《南洋客屬總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1929-2009》。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

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2006，《馬來西亞棵樹會館史料彙編（上冊）》。吉隆坡：馬來西亞客家工會聯合會。

陳松沾主編，1989，《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

陳麗華，2015，《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黃賢強編，2007，《新加坡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黃賢強主編，2008，《新加坡客家文化與社群》。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屬總會、茶陽【大埔】會館。

黃賢強，2011，〈新加坡永定會館：從會議記錄和會刊看會館的演變〉。頁 33-64。收錄於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探究專題中心。

黃淑玲、利亮時，2011，〈共進與分途：二戰後新馬客家會館的發展比較〉。頁 114-130。收錄於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探究專題中心。

黃力堅，2012，〈抗戰熱潮中的新加坡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活動〉。頁 3-51。收錄於黃力堅，《新加坡客家會館與文化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張翰璧、張維安，2005，〈東南亞客家族群認同與族群關係：以中央大學馬來西亞客籍僑生為例〉。《台灣東南亞學刊》2（1）：149-182。

崔貴強，2007，《新加坡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1945-1959（修訂卷）》。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

蔡志祥，2003，〈汕頭開埠與海外潮人身份認同的建構——以越南西貢堤岸市的議案會館為例〉。頁 502-520。收錄於李志賢主編，《海外潮人的移民經驗》。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

蔡志祥，2011，〈本土化、區域化和全球化：華社與故鄉及世界的聯繫——以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為例〉。頁 502-518。收錄於黃賢強主編，《族群、歷史與文化：跨域研究東南亞和東亞——慶祝王賡武教授八秩晉一華誕專集》。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創作室。

蕭新煌、張維安等著，2005，〈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亞太研究論壇》28：185-219。

賴涯橋編修，2009[1939]，《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特刊（復刻版）》。新加坡：客屬總會。

賴郁如，2018，〈新加坡客家的多層次認同（1820-1930）〉。頁340-359。收錄於莊英章、黃宣衛編，《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Goodman, Byran, 1995,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 1937*.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ra, Fujio, 2003, *Malayan Chinese and China: Conversion i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1945-1957*.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Hsiao, Hsin-Huang Michael, LIM Khay Thiong, 2007, “The Formation and Limita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 (1) : 3-28.

Kuhn, Philip A., 2008,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The Straits Times, 14 September 1934, p. 13.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5 September 1934, p. 3.

Tarling, Nicolas edited, 1992,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ng, Gungwu, 1970,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43: 1-30.

Wang, Gungwu, 1985,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pp. 1-21. In Jennifer W.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